

【社團巡禮】

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簡介

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由香港聯泰國際集團董事長陳守仁先生與孫中山先生之孫女孫穗芳女士、全國僑聯常委陳金烈先生於1998年3月共同發起籌備，同年8月在香港正式註冊成立。基金會宗旨是紀念孫中山，宣揚其歷史功績，弘揚其民主、愛國精神及“天下為公”的崇高思想，推動中國各地文化教育福利事業的發展。

基金會設主席、副主席。現任主席陳守仁先生，副主席陳金烈、陳亨利先生。基金會採用理事制，基金會發起人為永遠常務理事，由常務理事會提名聘請理事若干人組成理事會。基金會名義主席為孫穗芳女士。基金會敦聘德高望重、熱心文教福利事業及本會會務的知名人士出任顧問。

自成立以來，基金會開展了一系列有關活動。例如，全國僑聯於1998年12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儀式，由陳守仁主席介紹基金會成立情況，並向全國僑聯屬下的中國華僑經濟文化基金會捐贈人民幣120萬元設立“孫中山文教福利專項基金”，用於資助、獎勵僑界文教活動。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蔣振華、全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等領導人出席了儀式。過去兩年來，基金會分別在福建、江西及西北等地興建多處“孫中山希望小學”、“孫中山愛心小學”，並為北大、清華等多間大學貧困學生提供助學金，及資助福建泉州的學校添置電腦設備等。在孫中山思想學術研究方面，基金會先後捐資協助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成立孫中山研究中心。2001年恰逢辛亥革命90周年暨孫中山誕辰135周年。基金會參與資助並組織一系列紀念活動。例如，與北京大學、台灣國父紀念館一起，聯合主辦將於9月份在北京舉行的“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學術研討會”。為提高社會人士和大專、高中學生研習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並學習孫中山的崇高精神，基金會並分別在香港和內地主辦“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徵文比賽”。

基金會以陳守仁家族捐出的港幣一千萬元作為基本金，原則上以利息收入作為活動經費。

（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提供）

【學界消息】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徵文比賽

主辦：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

承辦：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香港近代中國史學會

協辦：大公報、香港中山學會

二〇〇一年是孫中山誕生一百三十五周年，又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紀念。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特發起「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徵文比賽，歡迎香港、澳門兩地社會各界人士、大專院校及高中學生參加。

徵文比賽分為公開組、大專組、高中組，各組均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獎金由港幣八千元至一千元，所有參賽者均可獲得紀念品一份。參賽截止日期為八月十五日，公佈結果及頒獎日期預定在十月下旬。

主辦者為隆重其事，已邀請三十多位社會名人、大學校長及文教界專家學者，分別擔任顧問及各組總選評判，並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承辦。聯絡處及稿件收集處設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如有查詢，請致電二三三九七一〇七。

顧問、工作委員、總選評判名錄（排名依筆劃次序）

顧問：
王國華（大公報社社長）
吳清輝（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李焯芬（香港大學副校長）
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高敬德（香港中華文化促進總會會長）
張信剛（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郭炳聯（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陳守仁（孫中山文教基金會主席）
陳坤耀（嶺南大學校長）
陳金烈（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副主席）
陳萬雄（商務印書館董事總經理兼總編輯）
潘漢唐（香港台灣工商協會會長）
譚尚渭（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饒宗頤（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教授）

工作委員會籌委：

李和協（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理事）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林振寶（中國高等院校香港校友會聯合會會長）
林啟彥（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陳仲昇（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執行秘書）
黃嫣梨（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長）

總選評判：

公開組：高美慶（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黃嫣梨（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長）
董橋（著名作家）
劉兆佳（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盧瑋鑾（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

大專組：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林啟彥（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陳方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單周堯（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霍啟昌（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

高中組：李家駒（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總監）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屈啟秋（新亞中學校長）
梁操雅（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教學實習統籌主任）
潘萱蔚（北區中學校長會主席）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人物研究】

文天祥、王守仁、舒位與龔自珍

王煜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清代陽明學透露於黃宗羲、陳確、孫奇逢、李顥、唐甄、毛奇齡、李紱，¹但是王學亦感染詩人，尤其是舒位和龔自珍。乾嘉盛世卓越詩哲舒位（立人，鐵雲，1765—1815）生卒同於吳門（蘇州），卻是直隸大興（北京市）人，壽命比陽明短六載，似陽明與西南（特別是貴州）結下不解之緣。十四歲少年舒位跟從祖父到廣西永福，因其官署後面有鐵雲山而自號。十年後他在北京苦讀，乾隆時代三大詩人之一趙翼以八十高齡而和他訂忘年交，譽稱「豈惟畏友，兼藉師資。」國子監祭酒法式善為他與才子王曇、孫原湘寫〈三君詠〉。可惜舒位只考中舉人。嘉慶二年他為河間太守王朝梧服務時，黔西南籠府仲苗韋朝元、王囊仙叛變，他隨王朝梧赴黔西鎮壓仲苗成功，獲雲貴總督威勤侯勒保賞識。兩年後他返吳門，流浪於雲間（今上海松江縣）、會稽（浙江紹興）及金陵（南京），窮愁潦倒中作詩二千餘篇，可分諷世刺時、寫景懷古、論詩品藝、詠史評書四類。²尾類精粹在〈讀論語詩六十首〉。他強調結合學問和性情，否定嚴羽《滄浪詩話》「詩有別才，不關書也」的天才觀，恪尊孔孟、屈原、賈誼、諸葛亮、陶潛、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林逋、蘇軾、岳飛、文天祥及于謙，抨擊晉文公虛偽，採納袁枚「性靈」說推崇趙翼詩「鑄出真性情，鑿成大道理」。³即情理並茂。

孟子「浩然之氣」激勵文天祥在絕境撰〈正氣歌〉。須知文山是朱熹四傳弟子而非特尊孟子的陸派。舒位最少三次吟詠文氏：（一）〈宋文丞相論語題文歌〉：「丞相之文傳何時，作者真偽未可知。其間不復加考辨，信以傳信疑傳疑。當年第一邁陽九，考官擊節稱其奇。詔書再起時事改，撫几散盡千金貲。上郡豪傑勤帝室，中年絲竹驅歌姬。一成一旅雖可用，三戰三北誰能支？中間不合大如礪，天荒地老兵馬司。狂人兵起大倉卒（猖猝），從容就義請死之。浩蕩〈正氣歌〉，感嘆臨終詩。與汝偕隱有遺恨，事君致身無媿（愧）辭。即論文章已奇絕，況有忠孝相扶持。大都（北京）承旨技可惜，南朝（宋）降表辭尤卑。除非生祭與卻聘，不爾慟哭登西台。乃知大節不可奪，日星河嶽常昭垂。張睢陽（張巡）詩諸葛表（〈出師表〉），豈惟重其文辭為！」⁴此詩濃縮文相國一生。⁵完美主義者狀元文天祥由考官王應麟拔擢，曾享奢侈豪華，慘遭漢奸張弘範擒捕押解返京。

文山殉國盡忠，要求其弟養母盡孝。難怪謝翱登西台為他痛哭流涕。「大節」可能影響陽明在貴州修文縣撰〈君子亭記〉以竹節喻氣節，即顯揚孟學。

(二)〈謁文丞相祠〉：「崖山（在廣東新會）浪花白，燕山血花碧。鬼火陰房五百年，春風又綠銅駝陌。君不見零丁（伶仃）洋中海水飛，又不見萬年枝上掛僧衣。六陵夜月暗於鏡白骨瘦盡冬青肥。江潮況避錢唐（塘）弩，萬灶貔貅自歌舞。降表纜書謝道清，祭文早就王炎午。一歌白雁來，再歌朱鳥化。擊節參軍如意邊，招魂丞相祠堂下。風簷曾讀文山詩，蕭條異代不可支。乎拳芙蓉唱青石，曠世之感今視昔。吁嗟黃冠（道士）歸未得，花外啼鴉關塞黑。風沙柴市好名聲，香火泥牆古顏色。決眚西峰斜日曛，翠旗欲下雲中君。千秋願奏〈神弦曲〉，恨少彈琴汪水雲。」⁶文山〈過零丁洋〉「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門徒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宣稱：「雖（在贛州）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柴市乃斬決文山之刑場，凝結燕山碧血，令人聯想晚清遇難「六君子」中康廣仁之兄有為亦尊崇陽明學。

(三)〈文丞相祠〉：「錢唐江上看揚塵，瓜步洲邊暗問津。奉幣不充祈請使，銜枚肯作說降人？千秋柴市酬生祭，一嶺梅花現後身。（原註：明史閣部夢文丞相入室而生，見《明史稿本傳》。賴有孤城三日住，至今俎豆尚莘莘（殷勤）。）」⁷舒位不提顧炎武，儘管世人皆合他崇拜王炎午而改名炎武。⁸然而亭林鄙薄王衍、王安石與王守仁。梅花象徵史可法氣節，其母曾夢遇文山；舒鐵雲誕生時，其母不夢梅花或忠臣烈士，而和尚手折桂花從四川峨嵋山來，遂命名犀禪。桂（木犀）花清香啟迪黃庭堅悟道，卻無關節操。

舒位關注朱陸異同，在〈象山懷古〉並尊朱陸，甚至傾向三教合一：「龍虎山人吹鐵笛，賣誇痴符作霹靂。象山山人講學來，藐姑一笑傾雲台。吾黨讀書別義利，門戶水火可捐棄。不然白鹿洞中言，眼淚何曾有同異！紫陽之學無不醇，金谿（陸子）之學無不真。即如釋迦與老子，彼亦絕頂聰明人。我意古人各有得，刪除〈語錄〉割講席。直從千載悵蕭條，豈為兩家通騎驛。目論耳食徒紛然，敢以後弊訾前賢。若見桃花能悟徹，請君去煮桃花吃。」龍虎山和象山分屬道教與理學勝地，藐姑山卻是莊周〈逍遙遊〉的仙山。孟子義利之辨由象山發揮，連「朱子亦謂其切中學者病根」（舒位自註）。鐵雲厭惡門戶之見，洞察朱陸皆闡揚孟學，堪讚醇真兩字。絕頂聰明始成教主，「教」取廣義包括哲學宗教。憑桃花源寄托理想的陶潛，徘徊三教之間而未能成為教主，遑論構劉關張桃園結義的羅貫中了。屈原飲蘭露且食菊瓣，可是不煮桃花。睿智反宗教的尼采，他仍須倍波斯最古老的宗教（祆或拜火教）始祖表達超人哲學呢！⁹現代新儒家懷抱深刻的門戶之見，偏崇程朱或陸王。非新儒家如張立文並尊朱陸。¹⁰

王守仁直承陸舒位〈陽明書院懷古〉賞譽他為文武雙全的忠孝完人：白簡劾蠶室，青謫龍場。遐陬鮮宦跡，以公為輝光。昔聞叱馭來，當道多豺狼。賢愚非一致，身世忽兩忘。仙亦無有筴，佛亦無有航。粹然儒者言，知能皆天良。公本第一流，功名爛無伍。逆奄（劉瑾乃閹寺）憎若蠅，強藩縛其虎。完人得忠孝，絕技綜文武。豈知始基之，乃在遷謫所。洞天有陽明，書院仍其名。徘徊不忍去，萬歲千秋情。公生既為英，沒〔歿〕則自有靈。公不坐而言，起亦自可行。將共天下寶，詎（拒）談紙上兵。始知講學事，無與公重輕。朱陸有同異，陽明亦流弊。且愁讀書多，於世工趨避。試昭闕古泉，何與武夷著草從此留，諫草從此刪。」¹¹孟子倡良知良能，鐵雲改稱知能皆天良。良知是體，事功是用，具備本來關係，即《莊子·天下》「內聖」與「外王」。外王包含工業，不必像牟鍾鑒教授在「外王」之外加添立業」。陽明功業分兩面，消極面在平亂，積極面在教育，特別是貴州教育與文化。「功名爛無伍」之爛非貶詞破敝，而是褒詞「絢爛」，即「燦若霞」。¹²

晚清龔自珍、陸以湉、林昌彝、譚獻、陳其元、徐世昌、邵祖平、汪佑、金天翻在不同程度欣賞舒位。¹³陽明曾探討「敬畏」和「洒落的辯證合」，¹⁴我認為舒位與龔自珍均能實踐敬畏和洒落。「洒落」源於老子「損之又損」、《莊子》「洒濯而（汝）心」及陸九淵「剝落」。定庵激賞鐵雲道：「詩人《瓶水》與《謨觴》，鬱怒清深兩擅場。如此高材勝高第，頭銜追贈薄三唐。」龔氏自註云：「鬱怒橫逸，舒鐵雲《瓶水齋》之詩也；清深淵雅，彭甘亭《小謨觴館》之詩也。（焜按：甘亭原名兆蓀）兩君皆死一紀矣。¹⁵龔自珍（璚人，定盦，1792—1841），浙江仁保（今杭州）人。他廿七歲中舉，兩年後擔任內閣中書；三十歲方中進士，因率直王遭排擠，十年後辭官返鄉，五十歲時逝丹陽書院，（比舒位短壽一歲。）外祖父段玉裁授以文字學，劉逢祿教他《公羊》學。¹⁶魏源晚年宗奉佛教華嚴宗，龔自珍皈依天台宗。但是定庵攝取宋明理學的整體論（holism）或機體哲學（organicism）云：「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鄰。一髮不可牽，牽之動全身。聖者胞與言，夫豈

誇大陳？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宗周若蠹蟲，嫫緜燒為塵。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憶黃河，對月思西秦。貴官切三思，以我為杞人！」¹⁷張載〈西銘〉「民吾胞也，物吾與也」被濃縮成「胞與」。「宗周」可能指改造王學的大儒劉蕺山，他悲辛慷慨地絕食殉明。定庵憂國憫民，當然不是憂天墜陷的杞人。他對國族危機先知先覺，但是未至於「反儒尊法」。¹⁸〈最錄李白集〉堅持：「莊（周）屈（原）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為心，自（李）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為氣，又自（李）白始也。」¹⁹屈原傾向儒學，龔自珍批判李白以心、氣融會儒俠而非三教，彷彿未知詩仙晚年傾向佛教，痴待來生升為金粟如來。定庵尊崇孔子，對理學和道教冷淡；卻將陽明心學與天台宗唯心論，極度膨脹為空前而未必絕後的私我論，代表晚清的唯意志主義。²⁰

雖倡心靈的多功能性，²¹定庵排斥孟荀人性論，在〈論私〉發揮告子（不害）的性無善惡論云：「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離，為附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床闥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忠臣……孝子……貞婦……乃私自貞私自葆也？……狸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闥之蔽……；禽之相交，徑直何私？……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禽耶？」²²針對理學「存王理、滅人欲」及「大公無私」的旗幟，龔自珍否定聖哲忠孝貞廉諸德絕對無私的可能性。他肯定人性自私自利，即人性要求滿足私欲。痛感婦女遭壓抑，他比有為更早反對纏足道：

「婦人不懶惰，畿輔可一淳」，主張女性投入農作。〈王癸之際胎觀第一〉²³將「自我」誇張至能創造天地、日月、山川和禽獸，成為中國唯意志論（voluntarism）先驅。王守仁強調良知創生宇宙，龔氏將「良知」改為「渴望男女共同生產創造。可惜定庵濫用有心的「私」指涉無心的天地日月。章太炎「俱分進化論」提出生物愈高級則善惡差距愈大。然則禽獸公私差距短於人類的。人的私心未必偏袒親友，甚至謀殺至親以奪財產。雄獅咬死親兒，僅為母獅交配而永不志在奪取食糧。但是動物性交不比人類大方公道，儘管禽獸不懂憑藉交配謀財。禽獸不能捨身取義，本能只驅使母獸捨生救兒吧！

中古重「我」傳統可追溯至孔孟與文天祥。對「形軀我」，文山主張「衛生」「理生」；對「精神我」，他宣稱：「某平生所立調何？豈有退居林麓，省咎敬威（畏），我自為我，而青蠅紛紛，每使惡至矣。」²⁴又謂「未來不必更臆度，我自存我謂之天。」²⁵這強調獨立人格超拔形軀，何況蒼蠅那樣討厭的投降（主和）派啊！文天祥批判釋道，堪列道統。蔡方鹿《中華道統思想史發展史》²⁶由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周）文王、武王、周公、《管子》、孔孟、荀、《易傳》、《禮記》、董仲舒、韓愈、孫復、石介、周張程朱陸、吳澄、王守仁至新儒家熊十力、馮友蘭、錢穆、牟宗三、唐君毅，旁及老莊及法家，遺漏胡璣、文天祥、王夫之、張君勱、賀麟和徐復觀。舒位究竟非思想家，不能進入道統。儒佛之間的梁漱溟，因終生信奉唯識宗而可不入道統。²⁷道統排斥佛教主觀唯心論，所以蔡方鹿不談龔自珍與魏源。王陽明雖倡良知創生天地鬼神，但是志在激勵同胞的主觀能動性或主體性，我們不宜執著字面而判為主觀唯心論。依照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三教的「知」俱備創生兼主宰兩義，「良知」乃儒家形態的「智」之直覺。王守仁《傳習錄中·答陸原靜書》說「良佑即是道」，〈惜陰說〉又謂「良知即天道」，可見孟學在道統的崇高位置。清代詩人中，舒鐵雲最理解此意。老子已將天道人格化，陽明則將主體良知普遍化、客觀化，甚至與終極實體「道」等同了。

1. 參閱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齊魯書社；卷一，1985；卷二，1988）。孫奇逢折衷朱陸，日闡釋漸。頓為下學上達，湯斌宗程朱而不薄陸王，毛奇齡批判程朱以維護陽明。李顥最忠於王學，取〈中庸〉「擇善」詮解格物，然而深受佛道兩教感染，反對博物而贊成博學。唐甄「尊孟宗王」（潘來語），比李顥純粹。

2. 曹光甫點校《瓶水齋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前言〉。以下簡稱此書為《瓶》。

3. 《瓶》〈前言〉頁7引舒位〈與甌北先生論詩並奉題見貽續鈔後〉。陳居淵《清代詩歌與王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也重視袁枚、趙翼和舒位，可惜錯字極繁。

4. 《瓶》卷1，頁13—14。
5. 請讀楊正典《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齊魯書社，1992），尤其是〈踐形論〉，見頁184—191。
6. 《瓶》卷5，頁196—197。
7. 《瓶》卷16，頁679—680。
8. 詳見沈嘉榮《顧炎武論考》（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
9. 成芳《尼采在中國》（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將中國的尼采熱分三期。志士利用王學與尼采哲學號召抗日。
10. 參考張立文《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的足蹟》（北京：中華書局，1992）。
11. 《瓶》卷6，頁242—243。
12. 《瓶》卷14，〈阮雲台（元）先生招集拈花寺即用見示寒食日遊萬柳堂宿寺中三〉，頁604。
13. 見《瓶》附錄三〈序跋評論〉。
14. 宜參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44—247。頁245引《王陽明全書》卷5〈答舒國用〉「惟夫不知洒落為吾心之體，敬畏為洒落之功，岐為二物而分其用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岐」應作「歧」，頁247「王純甫」宜用原名「王道」。
15. 《己亥雜詩》第114首，見《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十輯，頁520。參考王煜〈評盧善慶《中國近代美學思想史》〉，見夏威夷大學出版《中國宗教與哲學國際論壇》第一期（1996年3月），頁191—199。頁193「盡寫山背無山腴」，盧著誤作「盡寫出背山腴」；「陰頁洞」應作「陰洞」。
16. 參考孫欽善《龔自珍詩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前言〉。孫文光、王世芸《龔自珍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書局，1992）可讀。
17. 〈自春俎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其二，見《全集》第九輯，頁485。
18. 《全集》〈前言〉，頁13。此書出版於文化大革命末期，仍列定庵為法家。
19. 《全集》第三輯，頁255。龔自珍不研究道家道教，魏源卻有一套老子學。請閱熊鐵基、馬良懷、劉韶軍《中國老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第七章。
20. 值得細閱高瑞泉《天命的沒落：中國近代唯意坻論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1.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論衰世專制其法亦不及要領，徒戮其心，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一本作擔荷）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見《全集》第一輯，頁6—7。孟子視「能有廉恥心」（惡惡之心）為「義」之端，荀子卻側重心能思慮認知。
22. 《全集》第一輯，頁92。陳居淵《清代詩歌與王學》頁270，引〈論私〉，竟謬作「附庸間田……對帝哲後……和自葆……閨闈之敝」，共錯五字，如誤「后」為簡體而還原成「後」。
23. 《全集》第一輯，頁12。「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聖人也者，與眾人對立，與眾人為無盡。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為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尚翹，我理

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命紀。」參考王俊義、黃愛平《清代學術與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第七章。

24.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卷5〈與朱太博埴（號古平）〉，頁106。參閱張公鑑《文天祥生平及其詩詞研究》（台北：商務印書館，1989）。

25. 《全集》卷1〈贈曾一軒〉，頁9。同卷〈菴適菴丹士〉卻富道教色彩：「本是儒家子，學為方外事。此身恨覺短，有意求蟬蛻。猶留鼎餘藥，還授人間世，從君臥山中，苦談弘景（姓陶）祕。」

26. 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6。我曾在四川聯合大學「唐君毅研討會」評論第六章第一節。

27. 請看王煜《中西哲學論文集》（台北：水牛出版社，1995）〈梁漱溟是新佛家而非新儒家〉及本文補記。

【補記一】王守仁推崇文天摩而訶斥偽君子

《王陽明全集》卷7〈重修文山祠記〉云：「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應酬。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也；其次有所為焉，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忿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驚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為氣節。……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返）於正，不媿（愧）於公而已矣。……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蹟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修）其祠宇，彰其事蹟，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粉飾，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蹟者也。」聖人無所為而賢者有所為，偽君子或真小人利用建祠謀私，美化好勇鬥狠為氣節；私欲蒙蔽公理，極度對不起文天祥。

《歇庵集》卷6〈重修勳賢祠碑記〉揭示道妨事或事妨道的怪現象，像華嚴宗事理無礙觀主張道事不相妨，即道外無事、事外無道。然後詮釋「道」云：「堯謂之中，孔（子）謂之仁。至陽明王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良知者心之圖繪也，猶不識欠而曰炎也，百識水而曰濕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堯舜所以君，旦（周公）、奭（召公）之所以臣，率相與講……矢誥其義也。……後世豪傑之士，驚於功利，不復聞道。……先生……豁然頓獲本心於憂患艱貞之際。其道以不學不慮為宗，故千變萬容而常虛；以格物為用，故寥焉無一事而常實。……所明即所行，所言即所用。」世俗抨擊儒者疏闊無用、理學家虛靜不能成務定業。陶氏洞悉陽明「業以身示之，足以破群說，關（閉塞）眾喙；而道德事功之途，至是（此）合為一轍。」石簣遂倡「天乃以濂、洛還孔、顏、姚江還伊、周」，肯定王守仁的道統高位。同卷〈重修陽昌祠碑記〉歌頌「良知」乃判決人禽（獸）鬼之關，再說：「自私用智，生民之通蔽也。自私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害。此未達於良知之妙也。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聞泯睹，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形累捐矣，明乎良而心害遣矣。……良知在日用，非闊迂虛遠之謂。」推崇王守仁、王畿（汝中）師徒時，石簣已像龍溪以道家和禪宗概念闡釋良知兩字，比孟子原義複雜幾倍了。

【補記二】梁漱溟論良知或獨知

熊十力喜引王陽明〈詠良知詩〉「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梁漱溟《勉仁齋讀書錄》有〈讀陽明先生詠良知詩〉云：「良知……遇事而見，或時牽於一身一家一群之利害得失而昧之，

半夜醒來捫心自問，便覺不安。蓋身小而心大，從乎身，你吃飯我不飽，從乎心則痛癢相關、好惡相喻也。……天資卓越出群的人獨能從其偉大真切的痛癢好惡即良知（良心）起而革命，領導群眾改造社會習俗，即從啟發群眾的痛癢覺悟來領導群眾。……更有不因有所遇而恆時炯然不昧的良知。……此獨知寂而照，照而寂；心淨如虛空，遠離一切有。……此是宇宙本體也。世間森羅萬象，不出能見與所見對待之二分；而此則泯絕對待，恢復宇宙之一體性，而從體發用焉。……獨知之學，心不與物對，而自己卻默然而識之，學而不厭。……戒慎恐懼正是心之本體，……即本體即功夫是上智人們所有事。」梁氏融貫《四書》、《易傳》及佛學詮釋良知和革命。周武王和孫中山的革命比洪秀全高尚，因為後者考科舉失敗始改造耶教作精神武器。洪秀全不知身後激勵孫中山的良知。孫、梁不會贊同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此書連辛亥革命的意義也否定了。王守仁、梁漱溟及熊十力、牟宗三師徒強調良知的絕對性與感通性。梁氏〈閱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摘錄〉無「良知」一詞，而謂「心常清明籠照於身體與外物之間，而忘物我之對峙。」此心就是良知。

【人物研究】

從「師夷之長技……」到「執西用中」

—— 嚴復學西方思想的發展

林平漢

福建師範大學嚴復研究所

嚴復在1914年提出一個重要的新概念——「執西用中」。這個思想是對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指導思想的有力糾正。這說明嚴復晚年仍孜孜不倦地探索救國富國的真理。這個思想過去少為人注意。它的產生有其歷史淵源，與其前期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一．學西方先進思想的先導

自鴉片戰爭以來，有認之士從西方的船堅炮利認識到西方的工藝精良。要改變中國的落後狀態，不能沿襲傳統的「用夏變夷」封建觀念，必須向先進的西方學習。魏源首先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成為近代救國思想的一個重要的開端。到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早期改良主義者進一步由學習西方的技藝發展到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提出實行君主立憲制度、開國會、設公司、發展民族工商業等等。但這僅僅是思想火花，不成氣候。他們從娘胎中帶來的軟弱性，決定了他們不敢觸動封建的綱常名教，不敢懷疑中國的精神文明是落後的。

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由表層深入到裡層，由技藝、政制，提高到理論思維、價值觀念、世界觀、宇宙觀等等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在這方面，嚴復發揮了重要作用。嚴復對西方文化的理解與引進，著重在觀念形態領域。他認為西方文化的先進在於他們「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¹這才是西方處處先進的根本原因。

二．復致力於掃除阻礙中國進步的思想障礙

在引進西方先進文化。改變中國落後狀態的道路上橫躺著許多障礙。

第一是盲目排外思想。其根源是傳統的天朝上國觀念，加上愚昧無知的夜郎自大心理。

嚴復指出，在海禁已開，生存競爭愈來愈激烈的時代，排外的後果只能是更加愚昧落後，只有主動開通，改變閉關鎖國拒絕接受西方精神文明的傳統觀念，奮起直追，才能躋身於世界文明民族之林。他說：「期於文明可，期於排外不可。期於文明，則不排外而自排，期於排外，將外不可排，而反自害文明之路」。²

第二是由保孔教而引發的排斥西方文明的思想。保教說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頗為流行。因為戰敗後的不平等條約給予外國傳教士種種特殊，他們可以在中國各地為非作歹。從而激起中國人民的敵意與仇恨。這本是自然的、合理的。然而，事態的發展卻引發了中外文化之爭，把反對帝國主義傳教士的侵略與維護中國三綱五常道德相聯繫起來。宣稱「寧肯跟孔子進地獄，也不會隨耶穌進天堂」。³因保護儒家文化而抵制西方文化的傳播。從一個偏向傾斜到另一個偏向。在這個問題上，梁啟超的認識最初也是糊塗的。他在手訂的《時務學堂守約》中說：「異說(基督教)流行，所至強聒，挾以勢力，奇悍無比。嗚呼！及今不思自保，則吾教亡無日矣。今設學之意以宗法孔子為主義……」。⁴

嚴復一方面忠告維新派人士應該知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保教而進，則又非所保之本教也」。⁵一語點醒了梁啟超，改變了原來的觀點。另一方面，嚴復揭露了封建衛道士以保道為名，企圖保存封建舊學以抵制西方的新學。他指出：以孔子之道衡量今人，沒有一件事是皈依孔子的。這種人大言不慚自稱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為功臣也」。⁶他認為中國「今日實未嘗行孔教」。要真正「明孔教」，就要學西方的學說，「夫不讀萬國之書，不能明一先生之說也」。⁷當時「有一種自居名流……謂西學皆中土所已有，毫無新奇」。如議院制「本與三代法度相符」等之論據。古代有，當代卻無，這豈不是說孔學的真諦在中國已失傳，流傳到西方去了？「禮失而求諸野」。要找回失傳的聖學有必要立讀萬國之書。嚴復以這種推理方法反證學習西方新學的必要性，以緩解排斥西學的阻力，可見嚴復宣揚西學之苦心。

這種自居流者每見外國人的好處，總是說中國早就有了。譬如機器，其優越性是不爭的事實，他們說中國古代的魯班、墨子早已製造了。還說西學「實竊我中國古聖之緒餘」，「意欲揚己抑人，誇張博雅」，⁸不知羞愧。嚴復說，中國古代固然有指南針、火藥、印刷術、蠶桑等等發明足以眩耀。然而「古心之聖，亦何補吾黨之狂！」後人不求長進，放蕩驕恣，想依靠古人的聖明是難以挽救國家的虛弱。這種名流的言論形似愛國，實則妨礙國人虛心學習先進，其流弊誤國害民。

第二是似是而非的「中體西用」說妨礙了學習西方的精神文明。從而影響物質文明的充分吸收與傳播。

在晚清，「中體西用」說盛極一時，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思想怪胎，洋務派領袖之一的張之洞是此理論的代表人物，其名著《勸學篇》為代表作。英國在華的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著文宣傳，可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符合殖民者利益的指導思想。李提摩太於1891、1895年先後向張之洞、李鴻章建議，讓英國治理中國，中國成為英國的保護國，這代表帝國主義侵略者是非常鍾情於洋務派的買辦謬論。

持這種謬論者原來是信奉孔孟之道的封建衛道士。只是在西方侵略形勢咄咄逼人之下，他們不能不部份改變原來的立場與觀點，以適應新的形勢。但還是要堅持舊的三綱五常思想，不承認中國傳統文化的落後性。企圖以中學為核心，建立一種中西合璧的綜合文化。企圖把科學技術從整體的西方文化結構中剝離開來，「求用而不求體」，使之與中國舊學結合起來。這種學西方的做法，他們自以為是取我所需，其實是自欺欺人，在實踐上對國家有害無益。

「西學為用」並未繼續魏源等「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進步思想，而是「師夷之短技……」。因為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輸入中國的技藝基本上不是他們最新的、尖端的科學成果，大多數是陳舊的、過時的、已淘汰的產品。譬造兵船，西方列強已通用鐵殼船，而我們還在仿造人家過時的木殼船；西方列強已使用臥式輪機，戰時可避火炮，而我們還在造立式輪機，交戰時站著挨炮轟。無怪

乎中法馬尾海戰一觸即潰，全軍覆沒。負責指揮的軍政大員棄職鼠竊，以苟全性命。這場慘敗是對洋務思想的無情檢驗，類似的悲劇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又重演。這是「中學為體」必然產生的後果。

嚴復指出：自然科學、生產技術作為社會生產力的內在要素，必須通過一家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才能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技術與政治不是本末關係，都是國家富強的命脈所在。嚴復指出，西方先進國家之所以能富強，「不外於學求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⁹這就是科學與民主，以後五四運動時期形象比為德先生與賽先生(Democracy & Science)。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民主政制必須同時引進，如現代車之兩輪缺一不可。因為只有民主政制才能保障科技的順利成長與發展，封建專制與科學是不相容的。洋務運動失敗的文化背景即在於此。

三．卓越的愛國思想精華

針對洋務派的錯誤指導思想，嚴復早期雖提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思想，以破除洋務思想的影響，這兩句話反封建專制主義的含義鮮明，對社會進步的促進作用不可低估，但它的思想範疇與「中體西用」說並不同一。它在人們頭腦中不能取代「中體西用」概念。中體西用說還能起影響。嚴復經過長期的思索，到了晚年提出了「執西用中」的思想，作為重構中華文化的準則。

他說，應「依乎天理，執西用中，無一家死法，止於至善而已。」所謂「依乎天理」即順應自然，「執西」即後來魯迅說的拿來主義，吸取西方文化於我有益者；「用中」即以本國民族為主體，從切合中國的實際需要出發，不受僵化的陳規陋習拘束，以最完美為追求目標。這種提法與「中體西用」說不可同日而語，這是嚴復愛國主義思想的精華，猶如我們社會前進道路上的一盞明燈，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但由於嚴復並未專文闡述，影響不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不能發揮作用。

由此可見，嚴復的愛國主義思想精華並不限於他的早期思想，我們應該全面的去發掘整理嚴復的思想寶庫，不要讓塵土長期掩埋了珠璣。

-
1. 《嚴復集》第一冊，第3頁。
 2. 《嚴復集》第561頁。
 3. 王炳燮《毋自欺文集》第五卷。
 4. 《戊戌變法》資料(四)第505頁。
 5. 《嚴復集》第五冊，第1569頁。
 6. 《嚴復集》第一冊，第82頁。
 7. 《嚴復集》第一冊，第85頁。
 8. 《嚴復集》第52、53頁。
 9. 《嚴復集》第2頁。
-

【研究述評】

二十世紀中國醫學史研究的回顧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一) 引言

中國醫學有悠久的傳統，而且為人類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影響及於朝鮮、日本等國家及東南亞地區，近年更逐漸形成西方醫學系統以外另一個獨立的、現代的醫學體系。今後相信東西方的醫學會朝著加強交流、取長補短和互相促進的方向發展，為人類謀求更大的福祉。

以近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醫學發展的歷史，在1930年代已見成績；而較深入和全面的探討，則是最近二、三十年間的事。筆者曾撰寫〈中國醫學史研究述評〉，載《歷史與文化》第1期（1998年）；本文是在此基礎上再作補充，務求更全面地介紹二十世紀出版的中醫史研究及相關書籍，作為研究入門的階梯，除中文著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論著，不過基本上限於通論性撰述，專科專題的中醫史著作為數甚多，相信遺漏在所不免，這是要請專家學者見諒的。

(二) 二十世紀前期的研究概況

中國學界對醫學史的注意，始自二十世紀初年，不過早期出版的著作均屬西方醫學史範疇，並且都是從外文翻譯過來的。¹中國醫學史研究的先驅，首推陳邦賢（字冶愚，1889 - 1976）。他所著的《中國醫學史》，是中國第一部探討中醫歷史的著作。此書初由上海醫學書局於1920年發行，依次敘述太古、周秦、兩漢、晉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國的醫學，詳於今而略於古，清代和民國時期佔較大篇幅。著者對歷代醫政、名醫、名著及所形成的新學說、新成就作了系統的介紹，在疾病史的論述上亦多創見。²台北遠東圖書公司於1956年重印此書，但署中國醫學研究會主編。

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其後作了較大的修訂補充，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37年出版，收入王雲五、傅緯平主編《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一輯，自此更為學界所推重。修訂本內容分為上古醫學、中古醫學、近世醫學、現代醫學、疾病史五篇，敘述中國醫學的起源和演變、醫術的發展、外國醫學的傳入等。論者指出，此書「改文言為白話，特別是近現代醫學的論述，其引錄多注出處，且對史料堆集之弊有了較明顯的改變。」³台灣商務印書館曾於1958年據此版重印，所以流傳較為廣泛。

一批由中國人自著的醫學史書籍都不約而同在1930年代出現，反映了有關方面的研究已經時機成熟。當中有的介紹西方醫學史，⁴也有全面記敘世界各國醫學發展歷史的，如李濤（1901 - 1959）編著《醫學史綱》（上海：中華醫學會出版委員會，1940年），除論述西方醫學史外，還注意到各國醫學的互相交流，如中國醫學輸入日本，西域醫學傳到中國，以及西方醫學輸入印度、日本及中國等。⁵此外，有的著作注重西醫傳進中國後的情形，⁶也有關於中國醫藥衛生發展史的。⁷

王吉民（1889 - 1972）、伍連德（1879 - 1960）著《中國醫史》上、下卷（中央防疫處，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⁸第一部用英文撰寫的中國醫學史專著。此書上卷將中國傳統醫學發展分為四個時期：一、古代或傳說時期（公元前2697 - 前1122年）；二、黃金時期（公元前1121 - 前960年）；三、爭鳴時期（公元前961 - 公元1800年）；四、現代或轉折時期（公元1801 - 1936年）；下卷介紹現代醫學（即西醫）傳入中國的經過，以及西醫院、西醫院校和現代醫學教育的情形。此書是國外學術界了解中國醫學史的主要依據之一，至今仍有頗大的影響。⁹

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李濤的《醫學史綱》及王吉民、伍連德的英文《中國醫史》，被譽為早期的三部中國醫學史代表作。

還可介紹的是兩冊中醫中藥辭典。首先，是謝觀（字利?，1880 - 1950）等撰著的《中國醫學大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從醫學、身體、方名、藥名、病名、醫家、醫書七個方面，選收了七萬餘條詞目，凡三百五十萬字。作者編寫此辭典時，參考了二千餘種書籍，取材較為

廣泛，內容也較豐富。此辭典在1949年前曾再版數次，其後台灣商務印書館於1958年印行台灣版，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又於1995年影印出版，另外還有兩種改編本。¹⁰

其次，是陳存仁（1908 - 1990）主編的《中國藥學大辭典》上、下冊，約成書於1935年，收錄歷代文獻所載的各種藥物和藥物內容，包括命名、定義、處方、同名、古籍制名、外國名稱，以及學名、產地、形態、成分、效能等，近二百萬字。此辭典取材廣泛，解釋也較詳盡；但內容主要是羅列資料，兼收並蓄。學界指出其中有些論述不夠確切，引述資料亦間有錯誤。¹¹此辭典後來有香港上海印書館重印本。

（三）二十世紀後期中國內地的研究進展

1949年後，中國醫學史研究在中國內地續有進展。首先需要一提的，是陳邦賢編著的《中國醫學史》，1957年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第三次修訂本，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及更充分的史料，對醫學的起源、發展的動力、醫學史分期、史料的運用，都提出了新的見解，內容較前兩版有所提高。¹²

1970年代以來，有關中醫中藥的著作漸見增加，上海中醫學院編《中醫學基礎》（香港：商務印書館，1975年），是其中一種較容易入手的新編中醫學教材。此書將原有的《內經》、《傷寒論》、《溫病學》、《中醫診斷學》四門課程精簡為一，〈緒論〉且扼要介紹中國醫藥學的形成和發展。

賈得道著《中國醫學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中醫史專著中較具特色的著作之一，「著重闡述祖國醫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突出了中醫學是在古代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基礎上，通過整體觀察和長期醫療實踐，探索疾病發生、發展的規律，從而形成中醫辯證論治這一獨特體系。」¹³書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資料，對醫學理論的發展亦有較好的整理。

俞慎初著《中國醫學簡史》（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是一冊逾五百頁的著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現代五大歷史時期，闡述醫學發展與時代背景、社會制度、政治經濟、科學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現代醫學〉篇著重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醫藥衛生成就，尤為值得重視。¹⁴

范行準著《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對中醫的起源、發展、成熟、充實、衰變、孱守等幾個階段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此外，關於民間醫生的醫療活動對中國各學科的推動作用，傳信方在普及醫療保健事業中的功績，門閥與山林醫家的學術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傳染病對中醫理論和臨床的影響等，有較詳細的說明。

研究中國古代醫學史的著作，有：趙璞珊著《中國古代醫學》（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李經緯、李志東編著《中國古代醫學史略》（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史蘭華等編《中國傳統醫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綱·醫學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

郭成圩主編的《醫學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有關中國的部分很多。近年出版的中醫史講義漸多，¹⁵較新的一種是程之范主編《中外醫學史》（北京：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1997年），此書首述世界醫學史的發展，而以過半數篇幅介紹中國古代和近現代的醫學史。

史世勤主編《中醫傳日史略》（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介紹中醫傳入日本的歷史以及日本漢方醫學的發展概況，書中亦有日本著名漢醫及漢方醫籍的簡介。潘桂娟、樊正倫編著《日本漢方醫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4年），是全面探討日本漢方醫學發展史的專著。賈春華著《日本漢醫古方派研究》（長春：長春出版社，1996年），則專門探究日本的古方派。至於

中國醫藥傳入朝鮮的歷史，中文方面似乎未有專著出版，實在是很可惜的事，反而日本醫家曾作過較深入的探討。¹⁶

較為簡易的中醫史知識讀物，有傅維康著《杏林述珍——中醫藥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劉國柱編《中國醫學史話》（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此外，還有周一謀等編《中醫史話文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年）、顏克海編著《論中醫學術淵源·體系·發展》（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及陶御風、洪丕謨、王佑民著《中國傳統醫學漫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陳樂平著《醫俗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讀。醫家傳記有張志遠主編《中國歷代名醫百家傳》（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年），孫文奇編著《中國歷代名醫集錄》（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則介紹歷代名醫近千人。另一種值得推薦的小書，是黃倉、王旭東著《醫史與文明》（北京：中國醫藥出版社，1993年），從歷史角度對中西醫學的兩種體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醫學發展的歷史軌跡，強調「以史為鑒」、「以史為補」，使其成為中國醫學走向未來的階梯。

嚴世芸主編《中醫學術史》（上海：上海中醫學院，1989年），與一般的醫史比較，在學術的深度和廣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強調了中醫各家學說發展的脈絡。踏入1990年代，醫學與文化的關係受到較大的重視，李良松、郭洪濤編著《中國傳統文化與醫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醫學」的新學科概念，認為「文史醫學就是從中國文化史的角度來研究文史典籍中的醫學史料和醫學思想，以及醫學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¹⁷此書以外，還有高春媛、陶廣正著《文物考古與中醫學》（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現了兩種有關中國醫學文化史的著作：其一，是馬伯英著《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馬伯英、高晞、洪中立著《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上海：文匯出版社，1993年）。這兩種都是洋洋數十萬言的巨著，相信有關方面的研究，今後還會受到更大的重視，甚至朝著更專深的方向推進。

（四）二十世紀後期港台地區的研究進展

香港方面，1949年前後有不少內地醫家南來，中醫界較前蓬勃，當中亦有一些醫家致力於撰述，例如陳存仁著《中國醫學史圖鑑》（香港：香港上海印書館，1968年），亦題《中國醫學史》（香港：中國醫學研究所，1969年）。此書的英文譯本於1977年出版，亦可參考。¹⁸順帶一提，陳存仁曾接受香港《大人》雜誌之邀，連續撰寫了《銀元時代生活史》和《抗戰時代生活史》兩部關於舊上海生活的書，當中不少關於醫藥界的軼聞。《銀元時代生活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重刊，可以作為近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史料看待。

此外，有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國醫學史講義》（香港：醫藥衛生出版社，1968年）、呂尚志編寫《中國古代醫學家的發明和創造》（香港：上海書局，1971年），及上官良甫《中國醫學發展史》（香港：新力出版發行公司，1974年）、任勉芝《中國醫學史大綱》（香港：新亞醫藥出版社，1976年）。近年江潤祥、關培生合著《杏林史話——中國醫學史論文集》（香港：中大出版社，1990年），也有助於對中國醫學發展史的認識。謝永光編著《香港中醫藥史話》（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則是第一本探討百多年來中醫藥在香港發展的著作。

台灣方面，1960年代初有一種英文的中醫史出版，¹⁹此書附有中文翻譯，題為《中國古今醫藥史綱與美蘇醫學進展鱗爪》，署徐學嶸原著、王吉人審校、王以文節譯，在台中印刷，但無出版社及出版地。較早的中文出版物，有杜聰明（1893 - 1986）著《中西醫學史略》（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66年）。杜聰明早年留學日本，其後赴歐美深造，歷任台灣大學教授及醫學院院長等職，在醫學界享有盛譽。

1970年代以來，相繼出版了一些有關中國醫學史的著作。最早的一種，當推劉伯驥著《中國醫學史》上、下冊（台北：華岡出版部，1974年）。此書除導言外，共分十章，從醫政制度、病名、疫病、藥物、名醫傳、重要之醫典、醫藥教育等方面，分述各時代醫學發展的狀況及其特點，在同類著作中，是比較詳細的一種。論者指出，該書在論述西醫傳入後對中國醫學發展，以及中國醫學東傳韓國、日本，有較大的參考價值，且給讀者以新的啟示。²⁰其次，有陳勝昆著《中國傳統醫學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年）及《中國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學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

1980年代出版的中醫史著作，有鄭曼青、林品石編著《中華醫藥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及史仲序著《中國醫學史》（台北：正中書局，1984年）。鄭曼青、林品石此書是陳立夫主編「中華科學技藝史叢書」的一種，書首有陳立夫〈我對於中西醫藥的看法〉（代序），內容編排不依一般史書的朝代劃分，而按中醫藥的實質演變，分十六章論述，計為：中華醫藥源流、中華醫藥文獻中之最古醫典、《傷寒論》、中華醫學中之陰陽五行、中華醫學中之道家思想、病機、診法與脈法、治法與醫方、鍼灸學之發展、唐宋時代外國醫藥之傳入、金元四子之學及其流派、《本草綱目》、歷代醫政及醫學教育、醫德及禁例、近代醫學之大變、中醫之衰落及其未來。史仲序此書的處理方式則採折衷辦法，前五章敘述上古至清代的醫學，分為「巫醫相混」、「醫學隆盛」、「彙注醫籍」、「醫學噪鳴」及「醫學沒落」五個時期，後七章分論中西醫學貫通、針灸醫學經緯、中國藥學發展、歷代疾病載記、衛生保健紀要、歷代醫事制度、中國傳統醫德。²¹此外，還有一些不著撰人的普及讀物，如《中國醫藥史話》（台北：明文書局，1983年）、《中國醫學家史話》（台北：明文書局，1984年）等。

1990年代初，有王樹岐、李經緯、鄭金生合著《古老的中國醫學——中國醫學編年史研究》（台北：緯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近期出版的有二，一種是魏子孝、聶莉芳著《中醫中藥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另一種是甄志亞、傅維康主編《中國醫學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魏子孝、聶莉芳均畢業於北京中醫學院，任職中國中醫研究院，其書共有九章，記載中國自遠古至清代的醫學發展。甄志亞、傅維康主編之書，是由北京、上海、湖南、廣州，黑龍江的中醫學院教授合作撰寫，詳述醫藥學的起源（遠古至公元前二十一世紀）、早期的醫藥衛生實踐（夏代至春秋）、醫學理論體系的初步形成（戰國至三國）、醫藥學的全面發展（兩晉至五代）、醫藥學在實踐和理論上的新發展（明代至清代鴉片戰爭前）、近百年的中國醫藥學（1840-1949年），內容編排頗有條理，書末附有中國醫學大事年表，適合高等院校作為教學參考之用。

（五）有關中國醫學史的外文著作

197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中國醫學史亦開始留意，不過他們的角度多不純粹著眼於中醫史本身的發展，而是注重醫學思想、比較研究及當代情況等。²²近年，我們還可以在國際互聯電腦網頁上看到有關中國醫學及醫學史的研究發展概況。²³順帶一提，德文、法文方面，也有一些關於中國醫學史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²⁴

廖溫仁《支那中世醫學史》（京都：弘文社，1932年初版；東京：科學書院1981年重印本），是早期以日文寫成的中醫史著作。陳邦賢著、山本成之助譯《支那醫學史》（東京：大東出版社，1940年），據陳邦賢《中國醫學史》1937年版譯出。1990年代出版的有：石田秀美著《中國醫學思想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吉田莊人著《中國名醫列傳》（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年）；小曾戶洋著《中國醫學古典與日本——書誌與傳承》（東京：塙書房，1996年），主要透過中國古代醫學典籍研究中國醫學傳到日本的情形。順帶一提，赤堀昭介紹中國醫學史研究的專文，是很有用的入門參考。²⁵

日本方面稱中醫中藥為「漢方藥」，近年則以「東洋醫學」之名作為「西洋醫學」的對稱。所謂「東洋醫學」，就是指自古以來從中國傳入的醫學而經日本修飾和補充的醫療體系。1972年成立

的北里研究所附屬東洋醫學總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東洋醫學研究機關，該所所長大塚恭男著《東洋醫學》（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對東洋醫學與西洋醫學、日本的東洋醫學史、日本東洋醫學與中國醫學等問題均有簡明扼要的論述。

（六）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深化及其展望

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出版著作外，還要注意工具書的編纂和學術期刊的編印，這兩方面已取得若干成績。首先，有關中醫中藥的圖錄和工具書，1980年代以來相繼出現。例如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莊兆祥、李寧漢主編《香港中草藥》8輯（1978 - 2000年），又有蕭培根等主編《中國本草圖錄》12卷（與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合作出版，1988 - 1997年），這些都是科研成果的彩圖紀錄，為中醫中草藥研究奠下了更紮實的基礎。李經緯主編《中國古代醫史圖錄》（北京：人衛生出版社，1992年），收錄文物圖片二百六十種，從先秦到清代，供教學和參考之用。圖文配合的出版形式，是新時代的一種需要。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傳統醫學卷》（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是目前有關中國醫學史及相關知識最全面和完備的工具書。陳新謙編著《中華藥史紀年》（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4年），按年記載中國自遠古時代以來數千年間在藥學領域中比較重要的歷史事件，下迄1983年，亦方便參考。宋木文、劉景主編《中國圖書大辭典》（1949-1992）第13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為醫藥、衛生卷，有中醫、中藥著作近二千種的介紹。不過，平心而論，適合時代需要的參考工具書仍然十分缺乏，有待努力和改進。

其次，醫學史期刊的出版也漸受重視。比較集中地刊載中醫史論文的，是《中華醫史雜誌》（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創立的《醫史雜誌》，1953年更名為《中華醫史雜誌》，後曾停刊，及改稱《醫學史與保健組織》、《人民保健》，1980年起復刊，定為第十卷，而將前此各期編為九卷，由北京中華醫學會出版。²⁶至於二十世紀出版的醫史論文資料，為數雖然不少，估計逾一萬篇，²⁷但內容繁簡不一，水準參差不齊，影響所及，連帶一些具有較高水準的學術論文也被人忽略，學界對此必須加以檢討。

隨著大規模對中國醫學知識的整理和出版，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成果日見豐碩。由陳敏章、李經緯及多位專家學者合力編著的《中國醫學通史》，由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此書共四百餘萬字，分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會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現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醫史文物圖譜卷（收錄古代至1995年間的圖片近一千幅）。這是現時最具規模的中國醫學史著作，綜合了二十世紀多位醫家學者的心血結晶，希望從二十一世紀開始，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進展。

1. 據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自然科學·醫藥衛生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所錄，有：【英】馬克斐（R.C. Macfie）著、【英】高葆真（W.A. Cornaby）譯、曹曾涵校：《泰西醫術奇譚》（上海：廣學會，1911年）；丁福保譯：《西洋醫學史》（上海：醫學書局，1914年）。較後出版的，有周雲路譯：《醫術的浪漫史》（上海：廣學會，1929年）等。

2. 參閱方鳴、金輝、楊慧林、唐建福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要籍大辭典》（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陳邦賢編著《中國醫學史》〉條（李經緯撰），頁1223。

3. 同上註。關於陳邦賢的生平和貢獻，可參李經緯〈中國著名醫史學家——陳邦賢〉，《中華醫史雜誌》16卷4期（北京：中華醫學會，1986年），頁193-198；蔡景峰〈陳邦賢先生對中國疾病史研

究的貢獻)、王致譜〈陳邦賢先生早期醫史學研究工作〉及陳定閔〈醫學史家陳邦賢教授的人格修養與學術修養〉,《中華醫史雜誌》20卷1期(1990年),頁11-19。

4. 陶熾孫編:《西洋醫學史》(上海:東南醫學院出版股,1933年),相信是中國人自編關於西方醫學史的最早著作。此外。有【日】石川光昭著、沐紹良譯《醫學史話》(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

5. 參閱《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要籍大辭典》,〈李濤編著《醫學史綱》〉條(蔡景峰撰),頁1224。

6. 汪于岡、葛成慧著:《新醫業概況》(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1930年),介紹西醫輸入中國以後發展情況。此外,還有鮑鑒清著:《我國新醫之解剖學史》(自然科學季刊編輯部,1931年)及畢華德著:《我國西醫眼科之起源及現狀》(上海:中華醫學雜誌社,1931年)等小冊子。較後出版的,有江道源著:《十九世紀前中華基督教對於醫學之貢獻》(兗州:保祿印書館,1942年),介紹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際入華基督教教士在醫藥上的成績;又有范行准撰、余雲岫校:《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中華醫學史學會鈞石出版基金委員會,1943年)。

7. 如王吉民著:《中國歷代醫學之發明》(上海:新中醫出版部,1930年)、陶熾孫編:《中國醫學史》(上海:東南醫學院出版股,1933年)、馬允清編:《中國衛生制度變遷史》(天津:益世報館,1934年)等。

8. Wong, K. Ch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e Service, 1936; repr.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9. 參閱《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要籍大辭典》,〈王吉民、伍連德著《中國醫史》〉條(蔡景峰撰),頁1223-1224。關於王吉民的生平和貢獻,可參傅維康〈醫史園地悉心耕耘50年——著名醫史學家王吉民〉,《中華醫史雜誌》17卷3期(1987年),頁145-148。

10. 樊正倫、張年順根據謝觀等編《中國醫學大辭典》1926年重印本加以整理,由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此外,又有謝觀主編《中華醫學大辭典》上、下卷(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可見這辭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國醫學工具書,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和參考價值。

11. 參閱施宣圓、王有為、丁鳳麟、吳根梁主編:《中國文化辭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頁539。

12. 同註2。關於陳邦賢此書三個版本的異同,可參張慰豐〈中國醫學史研究的開拓者——陳邦賢〉及趙璞珊〈讀陳邦賢先生三部《中國醫學史》〉,《中華醫史雜誌》20卷1期(1990年),頁2-10。

13. 《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要籍大辭典》,〈賈得道著《中國醫學史略》〉條(傅芳撰),頁1225。

14. 關於俞慎初的《中國醫學簡史》,可進一步參閱余瀛鰲的書評,載《中華醫史雜誌》14卷4期(1984年),頁248-250。

15. 較重要的教材是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年),最初於1960年刊行,其後曾經修訂;此外,有甄志亞、傅維康主編《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年)及陝西中醫學院主編《中國醫學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三木榮著:《補訂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閣出版,1991年),包括作者的《朝鮮醫學史》和《朝鮮疾病史》兩種專書,內容甚為詳細,亦記述了中國醫學與朝鮮的關係。

17. 李良松、郭洪濤編著:《中國傳統文化與醫學》,頁1。此書共有三部分,上編總論包括〈文史醫學概述〉、〈文化背景與醫學通論〉兩章,中編各論分別探討甲骨文、十三經、諸子、史書、政書、文集、類書、詩詞散曲、筆記小說、古文史工具書及其他方面的醫學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編是文史醫學年表,其編排和內容結構,大抵上為文史醫學的研究豎立了規模。

18. Hsu, Hong-yen, Peacher, William G., *Chen's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Hong Kong, 1977). 此書有台北新醫藥出版社版,署許鴻源、畢毳·威廉編譯。

19. Evan H. Shu,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and the Review of Medical Progress in America and Russia*, 1962.

20. 參閱《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要籍大辭典》，〈劉伯驥著《中國醫學史》〉條（李經緯撰），頁1224。

21. 關於史仲序的《中國醫學史》，可進一步參閱趙石麟的書評，載《中國醫史雜誌》19卷3期（1989年），頁191-193。

22. 主要的著作有：

(1) Arthur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in Chinese and Other Societi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75);

(2) John Z. Bowers, William Hess, J., Nathan Sivin (eds.),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3)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4) Nathan Sivin,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5) P.Y. Ho and F.P. Lisowski,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ingapore, New Jersey, London, Hong Kong: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1997);

(6) Zhengou Wang,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msterdam: IOS Press, 1998).

23. 例如：(1) Chi Med -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Webpage, Online. Available: <http://endjinn.soas.ac.uk/Needham/Chimed/>;

(2) Dr. John H.F. Shen, Chinese Medicine. Online. Available:

<http://infinite.org/shen/cmbook/index.html>.

24. 德國方面，參閱文樹德（Paul U. Unschuld）〈中國醫學史的研究在聯邦德國〉，《中華醫史雜誌》17卷1期（1987年），頁64-65；其著作以英文出版的計有：

(1) 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2) Paul U. Unschuld,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Sixty Texts with Vocabulary and Translation, A Guide Research Aids and A General Glossary*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3) 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Historical Artefacts and Images* (International Book Import Service, Inc., 1999).

法國方面，1988年Dominique Hoizey 和Marie-Joseph Hoizey 編著《中國醫學史》（*Histoire de la médecine chinoise*），此書的簡介，見《中華醫史雜誌》19卷4期（1989年），頁215。英譯本於1993年出版：Dominique Hoizey and Marie-Joseph Hoizey, Translated by Paul Bailey, *A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Vancouver: UBC Press, 1993).

25. 見《亞細亞歷史研究入門》第3卷（京都：同朋舍，1983年），頁352-372。吉田寅〈中國醫學史研究之回顧〉，《立正大學文學部論叢》100號（1994年），則以作者本身的研究經歷為主。

26. 參閱〈關於本刊編卷的說明〉，《中華醫史雜誌》10卷1期（1980年）封底。有關此期刊一至十五卷的內容分析，可參陸肇基〈從《中華醫史雜誌》看我國的醫史研究〉，《中華醫史雜誌》17卷1期（1987年），頁1-7。

27. 根據嚴季瀾主編：《中醫文獻檢索》（北京：學苑出版社，1995年），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1980年編印的《醫學史論文資料索引》第一輯，收錄1903年至1978年間國內外出版的630餘種報刊雜誌上刊載的醫史論文資料10200種，1989年出版的第二輯，收錄1979年至1989年間出版的867種報刊雜誌上刊載的醫史論文資料12000餘種，其中包括外國醫學史在內。王吉民、傅維康合編：《中國醫史外文文獻索引》（上海：上海中醫學院醫史博物館，1966年），收錄1682年至1965年間國內外書刊上有關中國醫學史的外文著作和文獻1400餘種。近年來出版的論文尚未整理和統計。